

社会心理承受力的深层分析^{*}

罗桂芬 白南风 仇雨临

改革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本文通过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推论出如下主要观点:(一)人们的期望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呈负相关。高期望人群的构成表现出明显的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这些高期望群体是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最脆弱环节。(二)公众的风险意识与对变动的适应性显著增强,这为改革提供了较为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但人们实际的风险承受能力远低于抽象的风险意识,对不同方面、不同类型的具休风险,其心理准备与承受能力也有差异。(三)目前在中国社会各群体尤其是几大主要职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相对剥夺感,成为制约改革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重要变量。

作者:罗桂芬,女,1953年生,中国人民大学讲师;

白南风,男,1952年生,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仇雨临,男,1960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中国的改革事业进入90年以来开始步入新的阶段,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对社会承受能力构成了新的冲击。本文的重点在于探究现阶段制约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各相关因素,揭示它们之间的深层联系,进而勾勒出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弹性限度。

据以形成本文的资料来自1992年下半年由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主持的一项研究。此项研究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方式,全面获取公众态度的基本信息。调查选择了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5个城市作为调查样本,这5个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开封。在城市内采用随机原则下的按行政区划分层等距抽样方法(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居民),对居民进行入户调查。共发放问卷2500份,最后进入有效分析问卷2351份,有效回收率94.04%。样本分布情况大致如下:性别:男1388人(58.3%),女991人(41.7%);平均年龄42.3%岁;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33人(1.4%),小学154人(6.5%),初中623人(26.2%),高中或中专812人(34.2%),非全日制大学(如电大、夜大、函大、职大等)331人(13.9%),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423人(17.8%);职业:工人645人(27%),企业负责人及一般干部414人(17.3%),商业服务业人员141人(5.9%),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人及一般干部299人(12.5%),专业人员(包括教师、医务人员、科技人员等)278人(11.6%),民办、三资企业人员19人(0.8%),个体劳动者53人(2.2%),其他职业者537人(22.5%)。

* 本文数据的计算机处理由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张惠同志完成。

改革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包含三个层次的可操作性内容：一是公众对改革的一般评价和支持程度，二是人们对具体改革措施的接受程度，三是公众对现状的满意程度。本文用这三大类指标具体度量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强度和倾向性，分析的重点是从公众对现状的满意程度入手，探讨改革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种种制约因素，探讨诸变量之间的深层联系。

改革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其中公众的期望值，公众的风险意识及对变化的适应性，人们的相对剥夺感等直接与心理承受能力的强弱相关。

一、期望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

调查发现：期望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呈负相关，期望越高，心理承受能力越弱；各职业群体的期望倾向性不同，而不易实现的期望越强，越易产生挫折感，心理承受能力越弱。深化改革、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处理好这些职业群体的利益关系。

1. 高期望人群是承受力最弱的人群。

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接踵而来的不确定因素往往诱使人们对改革后果及自己的未来产生过高的预期，如对于经济收入的过高期望，对于政治参与的过高预期，对于消费水平的过高追求。这些预期往往超出改革现实所能提供和随的限度。在现实社会条件下，期望越高，实现程度就越低，因而对现状不满意感越强。（见表1—3）。

表1 期望程度与经济地位的满意程度（%）

期望	经济地位		
	不满意	无所谓	满意
低	50.0		50.0
中	44.6	23.4	32.0
高	73.6	13.4	13.0

$P=0.000$ $Gamma=-0.504$

表2 期望程度与社会地位的满意程度（%）

期望	社会地位		
	不满意	无所谓	满意
低			100.0
中	17.1	41.6	41.3
高	34.6	42.7	22.7

$P=0.000$ $Gamma=-0.387$

表3 期望程度与政治地位的满意程度（%）

期望	政治地位		
	不满意	无所谓	满意
低			100.0
中	14.4	42.2	43.4
高	26.0	48.1	26.0

$P=0.000$ $Gamma=-0.3347$

根据期望表调查结果，我们将公众的期望分为高、中、低三组，16—31分为低期望组，32—47分为中期望组，48—64分为高期望组。三个表的Gamma相关系数分别为-0.504，-0.387，-0.334，显著度均为0.000，表明期望程度与对现状的满意程度呈负相关。

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和赞成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他们的价值观念，二是改革目标与他们个人目标和利益之间的协调或一致程度。当人们评价改革时，首先要运用各自的价值观念去判断改革是好是坏，是应该还是不应该。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绝大多数人的

观念都已逐渐转变,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改革的意义,因而实际在这一层次上对改革持否定态度的人已经很少。这样,在目前阶段,公众对于改革的态度,就主要取决于第二个变量,即切身利益的得失。高期望人群从改革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比他们的期望要少得多,因而对改革现状满意度低。下一步改革措施如不能抑制或削弱他们的这一感觉,那么这部分人将是推进改革的强大阻碍力量。简言之,他们是承受力最弱的人群。从期望与满意度两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中得出的自然结论是,期望与实际间的差距越大,不满意感越强,心理承受力越弱。

2. 高期望群体的构成成分表现出明显的职业差异和地区差异,不同地区及利益群体的高期望指向各有侧重。

表 4 职业与期望程度

职业	政治期望	位次	职业期望	位次	社会期望	位次	经济期望	位次
工人	11. 457	8	11. 887	9	11. 743	9	11. 887	6
企业负责人	11. 130	12	12. 147	5	11. 414	13	11. 203	13
企业一般干部	11. 531	6	12. 164	4	11. 567	11	11. 845	7
高级宾馆员工	11. 176	10	12. 078	7	11. 882	6	11. 980	4
商、服务业人员	11. 644	4	11. 839	10	11. 816	8	12. 000	3
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人	11. 207	11	11. 780	11	11. 431	12	11. 644	10
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干部	11. 688	2	12. 232	3	11. 932	4	11. 975	5
中小学教师	11. 376	9	12. 000	8	11. 972	3	11. 706	9
专业人员	11. 647	3	12. 560	1	11. 850	7	12. 310	1
民办三资企业人员	11. 579	5	12. 105	6	12. 105	1	10. 842	14
个体劳动者	11. 509	7	11. 660	12	12. 057	2	11. 264	12
大学生、研究生	12. 126	1	12. 364	2	11. 885	5	12. 159	2
离退休人员	11. 104	13	11. 437	14	11. 233	14	11. 265	11
无固定职业者	10. 934	14	11. 613	13	11. 597	10	11. 710	8

表 5 城市与期望程度

城市	政治期望	位次	职业期望	位次	社会期望	位次	经济期望	位次
北京	11. 588	1	12. 077	1	11. 740	1	11. 869	3
上海	11. 345	5	11. 922	4	11. 702	2	11. 904	2
广州	11. 390	4	11. 962	2	11. 611	5	12. 042	1
沈阳	11. 408	3	11. 889	5	11. 663	3	11. 528	5
开封	11. 470	2	11. 946	3	11. 644	4	11. 571	4

表 4 为各职业群体在经济、职业、社会、政治四方面期望值的综合评分及等级排序,表 5 为所调查的 5 个城市公众在上述四方面期望值的综合评分及等级排序。从表 4 中看出,政治

期望最高的群体为大学生研究生，第二位为一般行政干部；高职业期望群体分别为专业人员、大学生研究生；高社会期望群体为民办三资企业和个体户；经济期望最高的两个群体是专业人员和大学生研究生。将这些方面的期望放入中国改革的大战略背景下考察，人们的经济期望较易实现，实现的程度也会相对较高，而政治参与期望的实现程度则会较低。**社会承受力的最脆弱点，是那些对不易实现的期望有高预期的群体。**因此，欲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其关键在于随着改革的进程，不断协调处理这几个群体的利益关系。

表 5 的资料告诉我们，人们上述四方面的期望强度及指向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北京人在政治、职业、社会三方面的期望强度都居 5 个城市之首；广州人在经济期望方面居首，职业期望居二；上海人在社会、经济两方面期望均为第二；而开封人、沈阳人四个方面基本都处于中间或最后状态。对这一调查结果的表层解释是：人们的期望与居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信息地位及开放程度紧密相关，经济社会越发展，开放程度越高，信息地位越重要，人们的期望被调动的也就越高。北京是全国文化政治中心，是众多重大信息的发源地和枢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因而人们的期望值也高；而广州的开放和经济发展程度在这 5 个城市中最高，因而这里人们的经济期望高于其他地区。上海、沈阳、开封三城市对比分析，所显示的仍是这一趋势。然而，这一调查结果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启示在于：北京这样的超级都市，其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弱，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合理格局，分配过度倾斜于大都市，致使享受种种优惠权利的大都市居民的期望持续地加速上升。因此，仅仅从增强全社会对于改革的承受力角度而言，也应考虑适当地弱化超级都市在所有方面发挥特殊功能这一状态，逐步改革过于倾斜的利益分配格局，更强调和重视按照社区和城市的条件自然发展，以减弱超级大都市社会动员过高给整个国家带来的震荡和冲击。改革大都市的这种畸形功能，是发展中国家稳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风险意识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

调查发现：公众的风险意识较 80 年代中期显著增强，然而实际的风险承受能力低于风险意识；人们对不同类型、不同方面的具体风险，其心理准备与承受能力有差异；由此构成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最富动态变化的部分，政府重大改革措施出台时须随时掌握上述特征的最新变动。

1. 公众抽象的风险意识显著提高，但实际风险承受能力低于风险意识。

风险意识作为心理状态的深层次内容，受多种因素影响，各人内在的价值取向、人格类型是制约人们不同风险意识和承受能力的关键因素。改革提高了社会生活中的风险程度，将人们置于一个以往所没有经历过的风险环境中，随着社会生活中所经验风险的增多，人们的风险意识也显著增强。表 6—8 反映了人们目前的风险意识。

表 6 生活方式选择 I

生活方式	%
风险型：1. 收入高，工作期间收入稳定，但可能失业	27.8
2. 收入高，无失业风险，但收入水平不稳定	44.8
平稳型：3. 收入水平稳定，无失业风险，但收入低	27.5

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工资较高，发挥特长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较多，但工作紧张，竞争激烈，物价波动，收入不稳定，并有失业可能，您是否愿意去那里工作和生活？

回 答：愿意	45.9%
无所谓	26.1%
不愿意	28.0%

表 6 显示，选择风险型生活方式的人在这次调查中为 73%，选择平稳型生活方式的人为 28%，将这一结果与 1986 年两次调查的结果相比较，十分有说服力的表明了人们风险意识的增强。1986 年 2 月和同年 7 月的两次调查中，选择风险型生活方式的人数比例分别为 11% 和 19%，选择平稳型生活方式的人分别为 77% 和 80%。时隔 6 年，这种选择的比例数刚好颠倒过来，这说明，经过改革实践的锻炼，人们的风险意识和承受力显著增强。

然而，人们的态度与行为往往不一致，仅仅凭公众的表层态度反应作为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的唯一依据，并不十分准确，还必须考虑公众的可能具有的行为倾向。为此，问卷中设计了行为倾向测量题目，用以考察在特定风险情景下人们可能采取的行为，调查结果如表 7 所示。从资料看出，此时，表示愿意选择这一高风险生活方式的人为 46%，表示拒绝的人为 28%。这一比例与表 6 差异较大之处并不在于对风险型生活方式持否定态度的人增多，而是持中间态度的人增多了。这说明人们对于风险的态度，在确定的风险条件下所表示的往往要较抽象谈论时更为谨慎和保守。这进一步告诉我们，人们的风险意识与实际的心理承受能力之间存在一段距离。改革十几年后虽然公众的风险意识增强，但实际承受力限度却较他们表示出来的为低，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必须充分考虑这一事实。

2. 公众对来自社会生活不同方面的风险，其承受能力存在差异。

改革带给人们的风险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样几项内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1) 改革给社会生活注入了竞争要素，这给了人们自主把握机会、获取成功的更大空间，然而也要求人们相应的承受竞争失败的风险；(2) 改革给社会生活增添了冒险色彩，开通了通过冒险达到各自目标的渠道，冒险本身就是巨大风险源；(3) 改革导致的社会急剧、持续的变化，使社会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变这种不确定性为确定性，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是存在风险的；(4) 改革给人们提供了发挥独立性的更开阔的环境，然而权利与义务对等，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个人面对风险随之提高。表 8 的资料显示了人们对上述四方面风险的承受能力状况。

表 8 人们对社会风险的承受能力

风险类型	综合平均分	位次
竞争	2.835	1
冒险	2.692	2
变化	2.636	3
独立性	2.442	4

可以看出，人们对来自竞争方面的风险承受力最强，依次“冒险”、“变化”，对独立权利方面的风险承受力最弱。

从上述分析中获得的结论性意见是：公众风险意识显著增强，这是一个极为有力的乐观信息。但人们对风险的实际承受能力可能会随具体的、确定的风险发生较大波动，有关方面必须密切注意和跟踪这方面的最现实变化，才能准确估计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限度。

三、相对剥夺感与社会心理承受能力

调查发现：普遍存在的相对剥夺感降低了公众对于改革的评价；几大主要职业群体的相对剥夺感程度较高；高期望人群相对剥夺感强烈，由此构成了社会心理承受力的最脆弱环节。

根据社会学和政治学对于社会改革的研究，在正经历着剧烈变迁的社会中社会成员极易普遍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这种社会心理对改革的影响极大，是发生社会动乱和革命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本研究对于相对剥夺感概念的界定：相对剥夺感是人们的一种否定性主观心理感受，它来自于自身的期望与自身认定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它可以分解为两类：第1类，人们将其他群体成员的状况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期望目标，将这一目标与自身状况比较，对其差异的否定性感受；第2类，人们将自己目前的状况与过去的状况比较，对相对地位变动的否定性感受。这两类相对剥夺感都分别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这三方面状况的比较结果，构成了人们相对剥夺感的内容。相对剥夺感的类型、强度、内容构成，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倾向。一系列特征表明，目前我国社会各社会群体中已普遍产生了相对剥夺感，成为制约改革的社会承受力的重要因素。

表9 各职业群体（第1类）经济地位的相对剥夺感强度*

职业	综合平均分	位次
个体劳动者	1. 981	1
民办三资企业人员	1. 632	2
高级宾馆人员	1. 608	3
企业负责人	1. 571	4
无固定职业者	1. 54	5
离退休人员	1. 480	6
商业、服务业人员	1. 443	7
工人	1. 426	8
大学生、研究生	1. 413	9
企业一般干部与技术人员	1. 352	10
中小学教师	1. 309	11
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干部	1. 300	12
专业人员	1. 240	13
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人	1. 237	14

$P=0.045$

* 问卷中对经济地位是按“过低、相称、过高”三个等级进行提问的，这里按过低1分，相称2分，过高3分计算综合平均分。分值越大，说明评价越高，相对剥夺感强度越低。表10、11同此。

1. 相对剥夺感较强的为城镇几个主要职业群体：专业人员、国家一般干部、工人和服务人员（见表9—11）。

表 10 各职业群体（第 1 类）社会地位的相对剥夺感强度

职业	综合平均分	位次
企业负责人	1. 886	1
大学生、研究生	1. 874	2
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人	1. 831	3
离退休人员	1. 773	4
无固定职业者	1. 746	5
民办三资企业人员	1. 737	6
企业一般干部与技术人员	1. 737	7
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干部	1. 735	8
高级宾馆人员	1. 728	9
工人	1. 650	10
商业、服务业人员	1. 640	11
个体劳动者	1. 623	12
专业人员	1. 620	13
中小学教师	1. 555	14

$P=0.0026$

表 11 各职业群体（第 1 类）政治地位的相对剥夺感强度

职业	综合平均分	位次
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人	1. 864	1
离退休人员	1. 833	2
大学生、研究生	1. 816	3
企业一般干部与技术人员	1. 787	4
企业负责人	1. 786	5
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干部	1. 755	6
中小学教师	1. 736	7
高级宾馆员工	1. 706	8
无固定职业者	1. 698	9
工人	1. 691	10
民办三资企业人员	1. 684	11
专业人员	1. 671	12
个体劳动者	1. 566	13
商业、服务业人员	1. 562	14

$P=0.0025$

人们评价社会现象，是观察者在一定的参照系中选定某一参照物进行对比形成各自态度

的过程，比较中认定的他人或他群体是人们评估自身利益得失所选定的参照物。比较中若认定自己比参照群体得到的少，就会有不公平感产生，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被剥夺了，由此形成第1类相对剥夺感。表9—11的资料显示了不同群体第1类相对剥夺感所表现的程度，表现最强的群体为：经济地位方面：国家干部、专业人员；社会地位方面：中小学教师、专业人员、个体户；政治地位方面：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户、专业人员。

中国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已涉及到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动，涉及到社会角色地位的重新组合，各职业群体的角色地位以及在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上的地位亦随之变化，这种变化具体包括社会声望和经济收入两大方面，前者表现在对某些群体社会身份和社会作用的重新评价，后者表现为一些群体的经济收入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在个体层次上，涉及到社会成员个人身份所具有的声望的上升或下降，收入的增加或减少。这些变化，有绝对方面的，也有相对方面的；人们将自己目前的相对地位与改革前比较，就产生了第2类相对剥夺感。不同利益群体在这些方面剥夺感及强度见表12—14。

表 12 各职业群体（第2类）经济地位的相对剥夺感强度*

职业	综合平均分	位次
个体劳动者	2. 774	1
高级宾馆员工	2. 745	2
民办三资企业员工	2. 737	3
中小学教师	2. 455	4
企业负责人	2. 443	5
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人	2. 390	6
商业服务业人员	2. 378	7
企业一般干部与技术人员	2. 350	8
无固定职业者	2. 270	9
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干部	2. 230	10
大学生、研究生	2. 207	11
工人	2. 183	12
专业人员	2. 090	13
离退休人员	2. 023	14

$P=0. 00614$

* 问卷中对经济地位按“下降了、没变化、上升了”三个等级进行提问，这里按下降了1分，没变化2分，上升了3分计算综合平均分数，分值越大，说明评价越高，相对剥夺感强度越低。表13、14同此。

表 13

各职业群体 (第 2 类) 社会地位的相对剥夺感强度

职业	综合平均分	位次
高级宾馆员工	2. 392	1
中小学教师	2. 355	2
个体劳动者	2. 321	3
民办三资企业人员	2. 316	4
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人	2. 288	5
企业负责人	2. 214	6
无固定职业者	2. 275	7
企业一般干部与技术人员	8	
大学生、研究生	2. 092	9
专业人员	2. 048	10
商业、服务业人员	2. 044	11
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干部	2. 004	12
离退休人员	1. 971	13
工人	1. 915	14

$P=0. 0003$

表 14

各职业群体 (第 2 类) 政治地位之相对剥夺感强度

职业	综合平均分	位次
中小学教师	2. 345	1
行政事业单位负责人	2. 271	2
高级宾馆员工	2. 216	3
无固定职业者	2. 143	4
企业一般干部与技术人员	2. 122	5
大学生、研究生	2. 115	6
个体劳动者	2. 113	7
专业人员	2. 096	8
企业负责人	2. 071	9
民办三资企业人员	2. 053	10
行政事业单位一般干部	2. 017	11
离退休人员	1. 997	12
商业、服务业人员	1. 967	13
工人	1. 948	14

$P=0. 0011$

据表 12—14 资料, 当人们从改革前后自身相对地位角度对比时, 相对剥夺感最强的群体

(即第2类)为:经济地位方面:离退休人员、专业人员、工人;社会地位方面:工人、离退休人员、一般机关干部;政治地位方面: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一般机关干部。

将上述资料综合分析看出,相对剥夺感最为强烈的是城镇几大主要职业群体;专业人员、国家一般干部、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专业人员第1类相对剥夺感的三个方面强度都很高;国家一般干部的相对剥夺感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相对剥夺感都体现为改革前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相对地位降低的负面感受。除上述几大职业群体外,个体户在现时社会、政治地位两方面也有较强的相对剥夺感;离退休人员第2类相对剥夺感强烈,这种情况是社会流动的正常现象,故排除相对剥夺感的讨论。

2. 相对剥夺感最强的群体期望高,对改革评价低,这些群体是社会承受力的最脆弱环节。

相对剥夺感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心理现象,最基本的诱发因素源于社会结构特征,而当其以社会态度作为表现形式时,又对现实的社会心理气氛产生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的过深讨论已超出本研究的框架,这里只根据调查结果,就它与社会心理承受力关联最密切的两个变项作出一些解释。

1. 相对剥夺感与期望

表 15 期望与第2类相对剥夺感交互分类表 (%)

地 位 期 望	经济地位			社会地位			政治地位		
	过低	相称	过高	过低	相称	过高	过低	相称	过高
低	50.0	50.0		100.0			100.0		
中	51.5	46.1	1.4	24.9	73.7	1.4	22.6	74.5	2.9
高	71.9	26.7	1.4	39.4	59.5	1.1	36.9	61.3	1.8
$Gamma = -0.334$			$Gamma = -0.317$			$Gamma = -0.323$			
$P = 0.000$									

表 15 资料所显示的趋势是,相对剥夺感与期望呈正相关,在不同期望的三组人群中,相对剥夺感强烈的人数比例随着期望的增高而扩大。一方面,相对剥夺感强烈的人群基本与中、高期望组的人群对应,同时,高期望组中相对剥夺感强烈的人又显著的高于中期望组。这一结果的引申含义是,期望高的人群相对剥夺感也强,这些群体构成了社会承受力最脆弱的环节。

② 相对剥夺感与对改革的评价

表 16 改革评价与第1类相对剥夺感交互分类表 (%)

地 位 改革评价	经济地位			社会地位			政治地位		
	过低	相称	过高	过低	相称	过高	过低	相称	过高
低	72.8	24.1	3.1	43.2	54.9	1.9	52.2	45.3	2.5
中	65.0	33.9	1.1	34.8	64.1	1.1	31.2	66.5	2.3
高	50.9	47.5	1.6	22.0	76.4	1.7	19.6	77.6	2.8
$Gamma = 0.275$			$Gamma = -0.293$			$Gamma = 0.329$			
$P = 0.000$									

表 16 的结果告诉我们，相对剥夺感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对改革的评价，相对剥夺感越强，对改革的评价越低。

任何社会改革都不会使所有人获益。中国的改革在有利于绝大多数人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也会使一部分人丧失一些利益。社会改革的客观效果，对于社会成员个体来说，一般是有得有失，由于利益得失的不平衡，一部分人产生相对剥夺感是必然的。但这种态度目前已在社会各个群体中普遍形成，尤其是作为社会主导力量的工人、专业人员、机关干部等主要职业群体相对剥夺感都很强，那么就不得不呼吁政府及各方面注意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应该对几年来各项改革措施给不同群体所带来的实际利益进行客观的、尽可能定量的分析，分别对各群体进行得失总平衡的估算和评价，使各群体的得失具体化、明朗化，得出公众承受能力的客观资料。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消除部分人的盲目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与此同时，积极引导人们进行合理有序的社会对比，这样才能控制相对剥夺感这种不良社会态度的继续发展，减少社会的内部压力，提高对于改革的承受能力；从宏观结构改革入手，适当调整不合理的分配格局，改善一些职业群体的实际地位。

社会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在理论上应该建立明确的格局，在实际操作上，要有相应的指向。对于社会资源与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动含糊其辞，“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必须努力改变，这是化解公众相对剥夺感的根本性办法。总体而言，在社会改革的实践中，利益分配的变化方向，应该朝着能使那些在未来社会结构中作为中坚力量的群体损失少一些，获得多一些转化，使这些群体成为推动社会改革的骨干力量，这样，改革才有内在的动力而保持平衡、稳定的发展。

责任编辑：张宛丽